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日治末期 (1930-1945) 台灣「工業化」之研究
R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aiwan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Japanese Domination (1930-1945)
計畫編號：NSC92-2415-H-004-007
執行期限：2003 年 8 月 1 日至 2004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黃紹恆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摘要

本研究計畫以日治末期 (1930-1945) 台灣的「工業化」為課題，並且將研究的焦點投注對 1950 年代以降開始發展的台灣資本主義而言，所具有之歷史意義為何？

關鍵字：台灣總督府、日本政府、工業化、日治末期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located in its effort to examine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aiwan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Japanese domination from 1930 to 1945 and also to spotlight what the historical meaning is given by the “industrialization” to Taiwan Capitalism that began from 1950’s .

Keywords : Formosan government , Japanese government , industrialization , the last years of Japanese domination

一、前言

眾所皆知，1930 年代以降台灣的「工業化」並非出於台灣經濟發展的階段性需求，而是配合日本侵略戰爭的需求，台灣所被賦予的三項任務（工業化、皇民化、日本南進基地化）中的一項。

隨著日本國內戰時體制的逐漸完備，台灣總督府在施政上的自主性，亦為日本政府收回（檜山幸夫，2004），因此大體而言，1930 年代降台灣總督府可說係在遵循日本政府的政策方針下，執行台灣「工業化」的各項政策，日治末期台灣的經濟便在此新的「他律性」狀況下進入新的階段。於是，在此時期的文獻或紀錄中，便可看到許多非製糖業的企業與工廠陸續在台灣建設、營運，構成 1930 年代以降台灣「工業化」的主要

內容。

本研究意圖將問題的焦點放置在 1930 年代以降台灣的「工業化」在台灣經濟史所佔的位置，而非只限於再度證明是日本侵略戰爭的產物而已。即以 1950 年代起作為獨立國民經濟體的「台灣資本主義」為前提，重新檢討 1930 年代以降的台灣「工業化」所具之歷史意義。

二、戰後台灣經濟史的時間起點

若將 1953 年出版的『台灣民營工廠名冊』（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出版）所載資料作大略整理，可知所紀錄的 1 萬 3669 家的民間工廠中，開設於 1945 年為止的工廠計 3763 家、1946—1948 年有 3391 家、1949—1953 年有 5758 家，如將開設時間不明的 457

家扣除，則此三階段的開設家數各佔全體的 28.5%、25.7%、43.6%。而總資本額為新台幣 2 億 5901 萬 4086 元，各階段的資本金額及佔全體的比例各為 7926 萬 2656 元及 30.31%、5577 萬 1818 元及 21.33%、1 億 2397 萬 9612 元及 47.41%（張怡敏 1996）。而平均資本額為新台幣 1 萬 8949 元，各階段為 2 萬 1064 元、1 萬 6447 元、2 萬 1532 元。換言之，僅就該名冊所載民營工廠的部份，日治時代的「遺產」無論在家數或資本金額可說佔了 1/3 的比重，而且明顯比戰後動亂期（即自 1945 年 10 月 25 日日本移交台灣至國民黨蔣介石政權逃到台灣為止的期間）更具規模。若是再將戰後初期以「日產」（敵產）名義收歸國營、公營或國民黨營的部份加總起來（其詳細可參照劉進慶 1975），可知日治時代的重要性恐不止於上述的 1/3 而已。

該名冊加上劉進慶教授對戰後台灣「公業」的計算，大致可說戰後台灣經濟的發展基礎已在日治時代奠定下來。其中 1930 年代以降的非製糖業工廠的簇生，即日治末期的台灣「工業化」實佔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因此吾人可說戰後台灣資本主義歷史性發展的起點，其實主要始自 1930 年代的「工業化」。相反地，若以 1953 年台灣開始施行第一次五年計畫為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開始，則 1930 年代「工業化」的影響可說一直延續到 1950 年代初。

無論是哪一種見解，對 1950 年代以降台灣資本主義的探討，1930 年代的「工業化」可說是個最起碼必然的

起點¹。

三、一國資本主義的工業化

從馬克思經濟學歷史理論的見地來看，所謂的「工業化」指涉的是一國政治、社會、經濟由前近代的「封建制生產樣式」演進到近代的「資本制生產樣式」之過程，更具體而言則為一國的「工業革命」過程，亦為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及勞資關係形成的過程，此過程的完成意味著一國資本主義建立的完成。台灣資本主義的成立必先要有政治上的獨立為前提，姑且不論當局者的意識形態如何，1950 年代以降的台灣已成為實質獨立的國民經濟體，因此 1953 年開始一連串的經建計畫，可視為國家權力自上而下地推動工業化（＝資本主義）的過程。只是其非憑空而來，至少 1930 年代以降的台灣「工業化」為其不可忽視的重要基礎。

換言之，在此認識之下，1930 年代的台灣「工業化」可說已開啓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序幕，換言之，從較長遠的歷史觀點論，1930 年代已然進入戰後台灣的範疇。惟當時台灣仍屬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將工業化加上括弧，以與 1950 年代後的工業化在概念上作一區隔。

如從資本原始積累的角度看漢族在台灣近四百餘年的歷史，可知在清代已然建立極為發達的地主制，土地所有關係複雜而地主資本之雄厚，並非統治者所能全然駕馭或忽略。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推行的「地

¹ 如果只以近代工業在台灣的發展論台灣的「工業化」，在時間上則可往前追溯到明治末期（20 世紀初）的近代製糖業的發展。

租改正」事業，其直接的動機可說在於歲收的考量，然而其效果卻是多方面，尤其對日本資本的進入台灣亦為「基礎工事」（矢內原忠雄，1927）。

不過，若與 1868 年明治政府成立後，同樣以財政考量推行「地租改正」政策，其結果經由近代土地制度的建立，對德川幕府（江戶時代）各地土地的實力者²給予法制上的事實承認，以此獲得穩固的政治權力基盤之史實對照，台灣總督府的「地租改正」事業亦可說具有相同的性格。台灣總督府長達 10 年土地改革的結果，清代台灣的地主階層並未因統治者的變更而消失（黃紹恆，1996）。因此，基本上而言，自 1930 年代起台灣的「工業化」過程，由「原始積累」過程中成長、發展的台灣地主資本乃至其他前期性資本（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之類）亦有某程度參與各種工業建設的實力。

四、日治末期台灣「工業化」的研究

基於上述的理解，有關此時期台灣「工業化」的檢討，有許多課題值得深入的探討及開發。

雖說台灣總督府在施政上逐漸喪失其獨自性，但是台灣總督府與日本政府就相關政策的制定、執行，仍需要相當程度的協調予折衝，而此又是經由如何的過程完成？日本國內的工業資本是在如何情況下進入台

灣？又遇到如何的問題及其營運成績如何？台灣在「工業化」過程中在資金、技術及勞動力的供需情形又是如何？

回顧有關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經濟始史的諸家研究，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就剛好到 1930 年代擱筆，未能就接著的「工業化」有進一步的論述。

1937 年出版，高橋龜吉所著的『現代台灣經濟論』，係接受台灣總督府的邀請來台灣作為期一個月的實地踏查後寫下的經濟時論（實則為其「高橋經濟研究所」的集體著作），因此無論在資料或是實地採訪方面，可以想見從台灣總督府獲得相當程度的協助。該著作最大的好處在於以日本（或日本資本主義）的立場來看台灣以米糖為核心的經濟構造，在所謂集團（bloc）經濟（即日後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及與列強集團經濟間的「求償主義」的「世界大勢」下，說明並主張當時台灣所應進行的應變，「工業化」為其中重要的途徑之一，相當能點出 1930 年代以降日本資本主義對台灣經濟的要求。不過，台灣在此書問世的 1937 年時點，尚未有具體的「工業化」實績，因此高橋的見解可說仍停留在觀念上的探討。

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經濟學講座教授楠井隆三所著『戰時台灣經濟論』，該書於 1944 年出版。楠井亦曾接受台灣總督府的委託，對戰時體制下的台灣經濟作調查研究，然而所撰寫的研究報告為台灣總督府認定事涉敏感，因此不允許此報告公開。幾經交涉及處理，終於有此設定為「非賣品」的著作出現。楠井在此書

² 在德川氏建立的江戶時代，農民雖對土地有排他性的使用權，原則上並不具所使用土地的所有權。不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富裕的農民逐漸向各藩領主階層取得實質上的所有權，而有「地主化」現象的出現。至德川幕府末年，已然成為各地土地的實力者（石井寬治）。

具體地整理自 1930 年代以降台灣「工業化」的總過程，並且作相當程度的檢討與批評。楠井亦贊同為配合日本資本主義的階段需求，台灣有必要變更以米糖為核心的產業構造而進行新的「工業化」。但是楠井更看到當時「工業化」的實際情形，其特別指出當時日本的工業資本未必有積極對台投資的意願，其中不乏只是將閑置不用的機械搬到台灣設置之情形，此外從購地、設廠到機械開始運作的過程中，遇到資材、技術乃至勞動力不足的種種問題。楠井研究最大的好處就在於他以同時代又為現地觀察者的立場，引領讀者更加貼近當時「工業化」的實際狀況，而能獲得較正確的認識。

戰後出版的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由於論述的重心不在此處，因此有關日治末期台灣「工業化」的部份予人言簡意賅之感，無論在論點或是史料上，恐怕仍未出楠井的『戰時台灣經濟論』的論述範圍。此外，晚近京都大學教授堀和生及其博士班學生堀內義昭亦有若干的探討，惟仍停留在外觀上的探討，亦未超過楠井研究。

五、1930 年代「工業化」的特徵

總的來說，台灣明顯全面捲入日本戰時體制要遲至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戰局由所謂「日中戰爭期」進入「太平洋戰爭」期之後才開始。不過，在日本政府與軍部的規劃，早在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便有較顯著的進展。然而，誠如楠井指出台灣的「工業化」並非出於日本資本主義或殖民地台灣經濟的階段性需求，相反地受

到政府動員，具有相當強烈的「時局性」則不容否定。因此，在此時期自清代起始終未受到重視的「後山」——花東地區，很突兀地開始有工業方面的移植與建設（林玉茹，2004）。西部地區的新興工業亦有類似情形，此點可從這些企業在戰後出版的企業史（「社史」）的記載輕易得到印證。

也因為屬於移植性質的工業建設，因此即使是如鋁業係遷就原料來自東南亞或是動力來自立霧溪而在台灣南部及東部設廠，但是台灣的人力資源並不足以提供所需要的工業人才，台北帝國大學的工學部要到日治末期才設置，緩不濟急。高橋及楠井皆提到從日本國內「工業移民」的問題，由此可推知台灣在工業人才的不足實情。影響所及，1945 年 10 月 25 日中國自日本接收台灣之後接著而來的日本人技術者陸續回國，在高級技術人員方面出現無法銜接的問題，結果使得是這些在 1930 年代起陸續建立起來的工業，特別是技術水準較高的重化工業，無法很快地從戰爭的破壞中復原。更重要的是移植來台的工業，於戰後徒留受到戰火破壞的工業設備，至於生產技術與體制則隨著日本人的離去而呈現斷絕的情形。

此外，或許可說與此工業人才不足問題互為因果，1930 年代建立起的工業並未能促成近代勞動者（=工人）階層的誕生。特別就此點，使得此時期在所建立的工業，宛如「飛地」般的存在，與周邊的台灣人社會未必有直接關聯或是帶來社會重大的變遷，這也可說造成這些工業無法落地生根的主要原因。實際上，在此一連串的「軍事工業化」的過程中，台灣人勞

動力依舊只在農業部門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而且是技術水準要求較低的農業勞動方面。

而在資本的參與方面，前節提及清代台灣發展出來的地主資本，進入日本統治時期依舊受到統治者的溫存而有繼續發展的情形，進而可為 1930 年代「工業化」提供資金。從涂照彥教授的「族系資本」研究可知在台灣總督府的勸誘、動員之下，的確扮演一定程度的資金提供者角色。然而，亦如日俄戰後台灣近代製糖業興起的情形，台灣人資本不僅無法成為主要的出資人，同時也無法掌握到企業的經營權，結果只是單純的出資者。也因此到戰後國府接收台灣之後，堂而皇之地將這些工業視為「日產」而予以沒收。

六、結語

若以附表所示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接收在台「日產」的情形可知，台灣的「工業化」雖自 1930 年代開始較積極地發展，然而製糖業依舊不改其居台灣工業首位的情形。換言之，這段不到 20 年的「工業化」，基本上並未根本改變台灣工業的結構。

就台灣經濟的歷史演變而言，儘管在此「工業化」過程中，台灣開始有非製糖業之重化學工業之出現，然而其發展中途因日本戰敗投降被受挫折，加上前節所檢討各點，可知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有限，不宜給予過高的評價。

不過，儘管如此，這些工業在所謂「日產」的處分之下，成為 1950 年代以降國民黨政權黨國資本（＝「國家獨占資本」）的主要部分，然而其存

在與營運對台灣的民間社會而言，至少在經驗上的確給予了工業發展的印象及見聞，對日後台灣的工業化仍發揮一定的功能。

另一方面，從台灣資本主義歷史性發展過程的角度論 1930 年代起的「工業化」，可知無論在資本（台灣人資本家）及勞動（台灣人勞動者）的形塑及動員方面，其所帶來的效果極為有限。因而 1950 年代起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得不在國家以「由上而下」的方式發展工業（工業化）的過程中，同時進行著「原始積累」的過程。只是此時的國家（國民黨政權）以黨國資本形式的「國家獨占資本」，介入並掌控這個過程，使得此積累過程呈現出獨特的風貌。

換言之，受到種種歷史因素的制約，1950 年代以降台灣資本主義的歷史性發展並不像英國資本主義一般，係先後經過「原始積累」、「工業革命」、「獨占壟斷」的過程而成立，反而是此三階段形成「三位一體」的奇特現象，在所謂反共的意識形態及東西冷戰對立的歷史背景下，呈現相當快速發展，而此點當可說是戰後新興工業國家——台灣——的獨特之處。

參考文獻

- 檜山幸夫，2004，「台灣總督府文書の史料論」（『第四屆台灣總督府文書學講習會』）。
- 張怡敏，1999，「戰後台灣民間資本累積—以紅糖經營者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5 期）。
- 劉進慶，1975，『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東京大學出版會）。
- 矢內原忠雄，1988，『帝國主義下の台灣』（岩波書店）。

黃紹恆，1996，「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台灣人資本的動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3期）。

高橋龜吉，1937年，『現代台灣經濟論』。

楠井隆三，1944，『戰時台灣經濟論』。

涂照彥，1975，『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大學出版會）。

林玉茹，2004，「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台灣的社會及其企業家」（『台大歷史學報』第33期）。

資源委員會接收在台「日產」總值

單位：法幣千元、%

業別	資產總值	占總值比例
電力	46 790 049	23.38
機械	3 329 514	1.66
化工	4 954 945	2.48
水泥	8 929 000	4.46
金屬礦	13 860 762	6.93
石油	5 742 476	2.87
糖業	103 785 023	51.85
紙業	12 763 511	6.38
總計	200 155 280	100.00

出處：資檔（28/（2）419）：「資源委員會接辦敵偽工礦事業資產估價總表」（轉引自鄭友等『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實與評價』上海社會科學出版會，1991年5月）。

說明：按1946年5月市價估計而得。